

总 序

汉族中的客家民系或曰客家族群,发祥于我国中原大地。由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早从秦汉时起,他们的先人就从中原不断往南迁徙,定居和繁衍于南方各个省(区)。进入近代以后,锁国封关的局面被打破,客家人本其勇于开拓进取、能够吃苦耐劳的精神,漂洋过海、出国谋生者也不少。他们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也为居住的省(区)或国家的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以致国权丧失、民族阽危。国难当头,客家儿女又本其热爱祖国、不畏强暴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开展反对封建压迫、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在维护民族尊严、争取国家独立、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中外人士的瞩目和赞许。因此,在 19 世纪末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对客家问题的关注,到 20 世纪 20 年代及其以后的几十年间,在以罗香林为代表的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开展了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在大陆各个客家省(区),客家联谊社团的组织,客家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世界客属恳亲活动的开展等等,使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

广西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成立于 2004 年 6 月,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赞助。它的宗旨是:加强和海内外客家乡亲以及从事客家研究同道们的联系,为弘扬客家历史文化、增进各族和各国人民的团结、促进祖国建设大业尽心尽力。为此,我们在做好客属日常联谊工作的同时,将在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以地域、人物和客家历史文化的个案研究为主,组织编写并出版客家研究系列丛书。

一是“客家区域文化”丛书。它以国内的几个客家大省(区)和客家移民较多的国家为基点,以一省(区)、一国一书的形式,分别研究该地客家人的历史和现状,他们与周邻居民的交往、发展、变化以及相互认同等等。通过区域“客情”的调查研究,为了解全国以至世界“客情”创造条件,从而使我们对客家民系的全貌得到比较真实和全面的认识。

二是“客家著名人物”丛书。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当代,涌现出不少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的著名客家人物,他们或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国际交往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宝贵的生命,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研究并为他们分别立传,目的是为后来者树立榜样,奋发向前。

三是“客家文化综论”丛书。客家历史文化的许多重大问题,学界已经作过不少研究。但是,当代社会正处于全面变革的进程中,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日益频繁,彼此吸纳无所不在,因此,我们对客家的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以文献资料与社会调查相结合,以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创新相结合,综论客家文化的重大问题,既看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又理出客家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在对外交往中出现的新事物,使我们的研究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三套丛书,归宗于“客家研究”一个大课题。我们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客家文化资源,拓宽研究视野,深入问题探索;立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努力写出课题新意,使研究成果具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深信:有广西师范大学领导的关怀和指导,有海内外客家乡亲和我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通过各方同道的共同努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开展交流和讨论,就可以逐步取得对问题的真实理解,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好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工作正在起步。瞻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将努力以赴,做好工作。谨以至诚,祈求方家和读者朋友们的及时批评和指导。

“客家研究丛书”

总主编 钟文典

2004年10月28日



目 录

总序 / 1

导言…… 刘义章 / 1

香港客家研究综述…… 陈丽华 / 1

作为中国国族事业的客家言说

——从香港看近代客家文化认同性质的变迁…… 陈永海 / 25

香港客家人的源流…… 刘镇发 / 46

香港新界客家张氏源流初探…… 张新霖 / 61

十约：沙头角地区的定居与政治…… 夏思义 / 81

香港的客家话…… 刘镇发 / 109

香港新界之客家民居…… 萧国健 / 136

香港客家教会的发展和贡献…… 李志刚 / 146

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 夏其龙 / 165

香港客家人与教育事业…… 刘义章 / 191

客家人对香港经济的贡献…… 朱石年 张新霖 / 205

香港客家菜馆与“正宗东江菜”…… 张展鸿 / 230

香港风水林土壤研究的意义…… 邹桂昌 马路华 魏远娥 / 245

以 21 世纪精神探讨香港客家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刘 育 / 255

后记 / 277

再版后记 / 279

导 言

刘义章

本书呈现香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客家认同”这一现象所起的关键作用,由此说明香港——作为新安县的一部分——客家的“渊源”。另一方面,随着香港客家人移居海外,几乎无远弗届,反映香港客家人“流迁路线的绵长”。尽管香港客家已经因为香港都市化而不断融入本地主流社会,但香港客家文化曾经有过一段璀璨的时期,本书希望为这些光辉留下一点记录。

本书的特点有三:其一,作者来自多个行业界别,包括教育、科研、工程、宗教、旅游等,而且都是学有专精。尽管他们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却因为对客家研究的共同爱好而走到一起,合作撰写本书。其二,作者群中有客家人也有非客家人,而前者包括香港原居民的后裔和“二战”后来到香港的新移民的下一代。其三,本书有关香港客家人与基督教的关系分别由两位神职人员兼博学之士撰写,他们同时从信仰与学术的视角观察这个对近代中国

史影响深远的课题。

本书的作者们探讨了香港客家文化的多个方面,包括族群源流、语言、民居、宗教信仰、环保意识、教育、饮食和生态旅游资源等。此外,陈丽华为香港的客家研究作了学术史的回顾。本书既可作为大学有关客家学和族群研究等课程的参考读物,同时对有兴趣了解客家历史文化的人士也具有参考价值。

香港人的来源是四个时期的移民:原居民、早期移民、“二战”前移民、“二战”后移民。客家人是唯一在四个时期均有移民到香港的方言群体。虽然客家人在原居民中是比较晚到的一支,但人数几乎跟本地人相同,而在早期移民中也占一定的比例,以至于客家话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是新界北部的通用语言,并曾经在乡村的私塾和早期的崇正中学中使用。

客家人移民香港的历史,大概从“迁界事件”开始。之后来港的客家人才觉得自己跟本地人不同,并且在后来产生了“客家意识”。其中,除了原居民是农民以外,早期移民到香港的客家人,很多都从事采石行业,为早期香港的建设流了不少汗水。

“迁界事件”和香港客家的关系是明显的。这在前辈学人例如日本学者濑川昌久的研究中^①已经相当清楚。明代以前已经在香港落户的本地人在“迁界事件”以后迁回的不多,所以清政府才招募其他地方的民众来开垦。这些主要来自粤东的农民的身份是客籍,他们因为方言的不同而跟本地人有别。时间一久,他们便面临跟本地人争考试名额的问题。由于本地人和客家人之间互不通婚,因而无法融合,客籍的身份也就被凸显出来。

外国人在 160 年前已经开始注意香港的客家人并展开相关研究,而香港学者比较系统地研究香港客家迄今也有半个世纪以上,这多少跟“客家认同”有关。陈永海指出“客家认同”本来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身份建构过程,他以 18 世纪初本地人和客籍人

^① 濑川昌久著《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士在生活上和政治上产生的矛盾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香港在客家认同建构的历史上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第一，“客家认同”的起源跟“迁界事件”有密切的关系，而香港是深受“迁界事件”影响的地方。香港本地人的“五大家族”从宋代到明代间已经来港开垦，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认同，跟后来因“迁界事件”前来的客籍移民截然不同，所以才有本地人和客家人之别。第二，香港在 1842 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得知香港的居民主要有本地人和客家人，便首先在香港学懂客家话，然后才转往内地传教。传教士与“客家”这个概念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第三，香港是客家基督教徒最早的聚脚点，结合了基督教和客家的认同以后，发展出客家人的传教事业。今天，香港的客家教会尽管已经因为社会变迁而本地化，但它对香港社会的影响仍然深远。第四，香港也是客家人凝聚力进一步发展的地方，代表客家人的团体崇正总会即于 1921 年在香港诞生。上述几点说明了香港对“客家认同”的建立曾经起了显著的作用。

客家人移民香港的历史，还可以从香港新界张姓移民的角度来观察。张新霖文章的论述让我们于此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他指出这些移民当中大部分都跟“迁界事件”有关。他们来自粤东北的五华、兴宁等地，在香港新界不同的角落建立了村庄，然后又到市区打工，也有些移民到世界各地。那些跟“迁界事件”无关的张姓移民，例如迁界以前便来港定居的，一般会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然而，事实上两者在远祖的认同上差别并不大。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墟市建立的经过观察客家人在香港定居的经过。夏思义的研究便描述了沙头角发展的历程。他指出，沙头角经过填海以后，变成了一个客家人的墟市，同时也描述了整个沙头角区过去 200 多年的变迁。客家人由于要寻找新的生活空间而来到沙头角，后来他们又因为可耕地有限，进行了一

系列的填海工程,子孙繁衍以后又移民到海外,过程相当特别。

萧国健介绍香港客家民居,反映了客家人尽可能地把原乡民居的建筑风格移到香港来。这样他们可以让自己的家虽然已经徙居他乡,仍然能感受到故乡生活的气息和品味。

李志刚和夏其龙让我们了解到客家基督教会在香港的发展经过。随着香港社会的发展,原来的乡村生活方式已经消失,土客对立的情况不复存在,香港的客家基督教会也随着社会变迁丢失了原来的客家风味,例如,客家话被广州话取代。李牧师以客家基督徒模范村崇谦堂说明香港客家村本地化的过程。夏神父指出天主教神父在客家村设立学校,为村民提供改善生活环境的条件,从而吸引了不少人信教。后来,随着香港社会的变迁,这些村落很多已经荒废,但天主教作为村民的信仰却巩固下来,成为他们在移民各地后的另一个身份标记。

客家人在香港热心办学。刘义章介绍了香港客家原居民在自己的乡村兴办书室、书塾,为村中子弟提供初等教育的情况。此外,香港崇正总会在市区先后创办了多间义学和崇正中学,而善团香港安庆堂则办天台学校,它们为清贫学童带来了受教育的机会。

张展鸿讨论了客家的饮食特色和饮食文化。20世纪以来,香港移民的来源开始多元化,潮州、四邑、福建、上海等方言群的人士开始涌入,客家人移民香港的人数比例相对减少,但在本港仍然形成很多小型社区。部分社区更发展出一些极富特色的客家菜肴,成为后来香港东江菜的主要代表。可惜客家饭馆未能跟上时代的潮流,结果难逃被淘汰的命运。不过,由于这几年香港兴起怀旧的热潮,又有人想起东江菜的滋味,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今天的客家菜将以一个新的风味展现于世人面前。

邹桂昌、马路华和魏远娥合撰有关“风水林”的文章,通过对

两座客家村落的研究,让读者了解“风水林”,特别是它们在环保和生态方面的积极意义。

虽然客家民居和“风水林”很容易在香港新界看到,但对它们有充分了解的人不多,更少有人会想过怎样保护它们,并且进一步将其开发成为旅游资源。客家文化随着香港的都市化而逐渐式微,香港客家人在过去 300 年间留下的不少痕迹,包括一些生活文化的特色渐渐被遗忘。这些东西是属于香港本土的,是香港整体的一部分。为了发展香港旅游事业,我们在香港建立迪斯尼主题公园,把美国的娱乐文化移植到香港来,却没有把我们即将消失的本土文化重新包装,将我们的原居民的生活方式展示出来,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刘育谈到香港可以仿效新西兰的经验,建立客家民俗文化村,使客家文化成为香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打造一种新的旅游品牌,以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如果这个构思能够实现,香港客家文化将会以一个崭新形式再现光芒,届时它对香港社会也将作出新的贡献。

本书每一篇文章的内容都是各有关作者研究有素或长期关注的课题。香港客家方言群体虽然随着社会变迁,已经融入香港主流社会,然而,他们在香港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书中篇章就记录了香港客家人在香港社会立足、打拼的事迹。

香港客家事象还有很多方面是本书没有涉及的,包括客家村落的人文现象和历史文化、客家社团、客家人与其他宗教如佛教以及他们与传统民间信仰的关系等。希望本书能够让读者方家进一步对香港客家文化产生兴趣,从而为推动客家研究稍尽绵力。

香港客家研究综述

陈丽华^①

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近代历史、政治形势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个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及 200 多个离岛的地域概念。不同时期大量涌入的移民,在这个舞台上进行着社会整合,也建构着不同的身份认同。

香港在一个半世纪中,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特殊性,使得它成为一个中文文献和西文文献交叉建构着“客家”族群的地方。于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主要是西方的传教士和学者,在英文文献中定义和记录着这个群体;20 世纪以降,随着新一轮的移民潮,在大陆民族主义和西方种族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族群概念也蔓延及香港;随后是西方学者将对“中国”的关注也倾注在对香港部分“客家”村落的研究中;80 年代以来本地学者研究队伍的壮大,及 90 年代以来“客家学”的兴起,使得对“客家”族群意识的研究空前高涨。

本文试图对这一脉络浅作勾勒,唯冀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① 陈丽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博士班学生,著有《国家意识与地域社会建构——以清代台湾“六堆”为例》(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导师 程美宝教授)现从事客家学术研究,尤其是有关台湾“六堆”的课题。

一、19 世纪西方传教士—学者对客家(Hakka)的记录

对香港地区客家居民民族志式的记录,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基督教团体巴色传道会(Basel Evangelical Missinary Society),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巴色会 1815 年成立于瑞士,1846 年,在 1831 年即来华传教的牧师郭士立(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的要求下,派遣韩山文牧师(Rev. Theodore Hamberg)及黎力基牧师(Rev. Rudolph Lechler)两人来华传教。郭士立通晓闽、粤地区主要方言,很早便注意到广东有被称为“客人”(Kea-jin)的人群。^①韩山文即跟随他学习客语,主要在香港,上溯珠江、东江、韩江一带的客家地区活动。^②由于其在宣教策略上重视宣教对象的本土语言,韩编纂了客家话字典的手写本,并由黎力基等几代传教士续编,于 1905 年出版。^③

清咸丰至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与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土客械斗,影响深远。一直致力于在客家人中传教的牧师韩山文,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仁玕有过接触,在他 1854 年所著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中,记录了客家人(Hakka)及其与广西本地人械斗的关系。文中将音译的 hakka,取代意译的定居者(settler),作为一个有着特殊语言的群体的称呼。^④

随后,礼贤传道会(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的高怀义牧师(Rev. Rudolph Krone),于 1859 年在旧的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所办的刊物 *Transactions*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A Notice of the Sanon District”(新安城)的文章,里面提到 40 年前有一份新安村落的名单,列出了 854 个村庄,其中 579 个是本地(Pun-ti)人定居的,275 个是客家(Hak-kas)村。^⑤在这里,他已经将 Hakka 这个发音记号,直接当作一个群体符号使用。

同时,18 世纪后半叶,英国在马来亚建立了殖民统治,1824 年又成立了海峡殖民地(Strait Settlements),主要由新加坡、檳城和马六甲三个港口城市组成。19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殖民地的开发与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华人涌入,如何分

① Charles Gutzlaff ; rev. by Andrew Reed,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 132.

② 李志刚《香港客家教会(巴色会)之设立及其在广东与北婆罗洲之传播》,见《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二),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1993 年 9 月版。汤泳诗《一个华南客家教会的研究——从巴色会到香港崇真会》,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2 年 11 月版。

③ D. MacIver, “Preface”, i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ong Province, prepared by D. MacIver, revised and rearranged by M. C. Mackenzie, 台北市: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2 年版。

④ Theodore Hamberg,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1854, pp. 3-4.

⑤ Rudolph Krone, A Notice of the Sanon District, reprinted b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 1967: 104-137. 高怀义所说材料,指的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重修的《新安县志》,其中卷二·輿地略中,列出了典史、县丞、官富司、福永司所管属的村庄,以及客籍村庄。(舒懋官修、王崇禧等纂《新安县志》,卷二·輿地略,嘉庆二十四年(1819)重修,香港一年翻印。)这两段材料连起来,便会给人一种印象,即 275 个村落中都是讲一种特殊方言的 Hak-kas。实际上,此处汉文的“客籍村落”,是清初迁海令废除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政府发布奖励开垦政策而陆续移入的,并不只有今天所说的“客家人”。



类和管理这些彼此矛盾重重的中国人,便成为殖民者要直接面对的问题。

1867年1月,一份名为《中日记录及访问》(*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的月刊,在香港创办,它的编辑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这一时期也是 *China Mail* 和 *China Review* 的新闻记者。这份刊物主要讨论殖民地政策与中国文化问题,从中也可以看出西方人迫切希望了解如何与中国人的不同群体打交道。一个署名为“新加坡”的人,询问新加坡与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来自哪些地区,应该学习何种方言才最易和他们沟通;^①也有人询问有没有客家话的书或者词汇表出版,他们主要分布在哪里等。^②

接下来的刊物中,一个署名为 G. M. C 的人,对于海峡殖民地华人情况作了详尽的回答。他将该地的中国人主要分成四类(four classes),即 Cantonese、Hakkas、Chaou-chows、Hainans,这种分类基于移民来自中国不同的原居地,以及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在他的观念中,Hakka 一词已经被放置进一个和地域、语言联系在一起的种族(race)概念中。

对于客家话的问题,则引发了一位著名的传教士、学者,此后也在香港政府任职的欧德礼(E. J. Eitel)的长篇回应。欧德礼是德国人,1862年加入巴色传道会来到香港,他先隶属于路德传教站,在一个名为李朗的讲客家话的小区传教,1865年转入伦敦传道会。他被视为是客家话、广东话的权威,对中国文化也颇有研究,出版过广东方言的中英字典,以及关于佛教、风水等多本著作。^③在1867至1868年的刊物中,数期连载了他的长文《客家人种志略》(*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将 Hak-ka(客家)视为一个不同于 Puntis(本地)和 Hok-lo(鹤/福佬)的 race(种族),并从地理分布、语言、风俗习性、山歌、宗教等方面,详细论证了这一种族与其他种族的不同。罗香林、郭寿华均视该文为西方文献中客家研究的重要作品。^④

欧德礼随后进入英国殖民政府服务。1875年,他被香港第七任总督坚尼地爵士(Sir Arthur Edward Kennedy)委任为学校用书委员会主席,其后任视学官19年(1878至1897年),并曾任法官和华民政务司。在1880年出版的《1879年政府教育年度报告》中,政府管理之下的西营

①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Hong Kong : Saint, Vol. 2, no. 3 (Mar. 1868) : 42.

②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Hong Kong : Saint, Vol. 1, no. 1 (Jan. 1867) : 7.

③ H. J. Lethbridge, "Introduction", in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④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集文书局,1933年11月广州初版,1975年1月版,4页;郭寿华:《客族源流新志:客家精神及文献》,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3年版,2页。

盘、灯笼洲的学校、教师等,都被分成 Hakka 和 Punti 两部分;而土瓜湾则分成 Hakka 和 Hoklo 两组。^①

1895 年,欧德礼出版了他最为著名的《欧洲在中国》(Europe in China)一书。书中,他将分布在香港岛和九龙的中国人分成三个种族(races),即 Puntis、Hakkas 和 Hoklos,^②尽管解释了 Puntis 意为原居民(aborigines),Hakkas 意为外来居住者(strangers),他们原来的移民过程与争斗过程并不是欧德礼所关心的,这些人在他看来,都是本地人(natives)中不同的类别(classes)而已。

这种分类方法在 1898 年英国政府租借新界后,在行政上得以应用。英国于 1899 年 4 月才正式占领新界;在这之前,政府派遣香港布政司洛克(J. H. Stewart Lockhart)对新界地区进行了勘查。

1878 年,年仅 20 岁的洛克便以军官学生(cadet officer)的身份来到香港,随后在香港殖民政府中任职。他也对中文和中国文化颇为精通。他在 1898 年 8 月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率调查团对新界进行了勘查,他承袭并创造了欧德礼等人的分类观念,将英国来港之初就注意到的水上人也作为一个种族(race)记录下来。在调查报告中,他将这一地区的汉人居民根据语言划分为三个种族(race)，“本地”、“客家”与“蜑家”(即水上人),并且各村落人口组成也被仔细地加以统计和记录。^③在他看来,“本地”人声称自己是广东的土著(natives of the soil),但实际上,他们也不是原居者(aboriginal inhabitants)。不管怎样,他们都是新界地区的居民(inhabitants)。这一概念在以后政府的报告中继续采用,成为整个新界地区人的称呼。

这一分类对于香港新界地方社会影响颇为深远。原本在清朝户籍中于科举制度下作为“客籍”,在土地关系上作为“佃户”的群体,现在都是殖民者眼中的“原居民”(aboriginal inhabitants)。伴随着土地关系与法律的改革,新界客家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渐与本地大族相抗衡。

20 世纪以后,随着大陆移民大量涌入香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受西方人种学观念影响形成的“客家意识”也传入香港。随着客籍“学者移民”赖际熙与罗香林先后来港,香港也成为客家研究的重镇。

① 1879 Annual Report on Government Education. 文中 Hakka、Punti、Hoklo 等词都注有音调,在 1884 年的 Report of the Inspector of Schools for 1883 Education 中,前两词便没有音调标出了,显示该词已经从“中文音译”转变成专有名词了。

②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31.

③ Downing Street,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No. 9, 6th January, 1899.



二、20 世纪上半叶的“学者移民”——赖际熙与罗香林

从晚清开始,由于中国急剧变动的政治环境,以及西方人种学观念的影响,一方面导致族群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建构同步高涨,另一方面也成了方言群间表达歧视的方式。^①尤其突出的是广东省,在 20 世纪初的乡土教材中,客家人便被描述成“非汉种”。^②1907 年,顺德人黄节所编的《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其第二课谓“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老二族,非粤种,亦非汉种”^③。由此引发了以邹鲁、温廷敬、钟用和等为首的客家学者成立“客族源流调查会”,形成一种有意识的“客家认同”建构。这种观念随着 20 世纪初近代城市、商业、出版业的发展而逐渐流传开来。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香港最著名的客家社团——崇正总会成立。按照罗香林的说法,1920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英文《世界地理》,又将客家描述成蛮族,引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客家人士的抗议,并设立客属大同会。第二年,广州派饶芙裳、姚雨平、黄炼百等人来港联络,于是一群旅居香港的客籍工商业者,包括李瑞琴、黄茂林、廖新基、徐仁寿、古瑞庭等,和学者赖际熙,共同倡导成立了这一团体。^④其创办目的,一方面是要大力支持工商业,也经营慈善事业;另一方面考证客家渊源,究其亲睦。^⑤

赖际熙是广东增城县岳潭埔人,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丞参部行走。^⑥民国时期,一批内地学者到港,在香港继续宣扬和维持中国传统文化,赖际熙即是其中之一。香港大学旧无中文系,他被聘创办并主持港大的汉文教育多年。

根据他的说法,“自辛亥岛居,奄忽十年。值岛中商旅,有崇正总会之设,得滥竽席末……”^⑦。1921 年被崇正总会选为会长,并连任 13 年。^⑧1924 年,他编制了十五卷本的《崇正同人系谱》,将地方志及谱牒的体例相结合,叙述客族源流与分布,以从文化源流上,证明其民族之优越。其卷一“源流”,叙述“客”这一“民族”的来源与迁徙;卷二“氏族”则分述丁、刁、王、方等 100 余姓氏从中原南迁之事。^⑨作为一位负

① Sow-Theng Leo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② 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68—84 页。

③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集文书局,1933 年 11 月广州初版,1975 年 1 月版,5 页;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81 页。

④ 乙堂:《香港崇正总会发展史》,见《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1950 年版。

⑤ 赖际熙主编:《崇正同人系谱》卷一,崇正同人系谱序,1995 年香港崇正总会编印,1 页。

⑥ 伍于瀚编辑:《愚卢文缘前集》上卷,一山,1926 年版,10—11 页。

⑦ 赖际熙主编:《崇正同人系谱》卷一,崇正同人系谱序,1995 年香港崇正总会编印。

⑧ 罗香林:《故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院长赖焕文先生传》,见《乙堂文存》卷二,香港:中国学社,1965 年版,92—95 页。

⑨ 赖际熙主编:《崇正同人系谱》卷一,源流;卷二,氏族,1995 年香港崇正总会编印。

有盛名的学者,他为客家在文化与系谱上“正本清源”起了重要的作用。

数十年后,由于罗香林的参与,赖际熙的传统得到了延续和发扬。罗香林 1949 年底移居香港,1951 年起也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和崇正总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赖际熙于 1937 年去世,两人并未共事,但相似的经历,令罗氏对其颇为敬仰推崇,^①并曾为其作传。其为客家“正本清源”的学说,更得到崇正总会的大力支持。

罗香林是广东省兴宁县人,1926 年入读清华大学历史系,随后就读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研究院。民国初期民俗研究兴起,罗香林即投身其中。1932 年起,他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1934 年转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1939 年再任中山大学教授,同时也曾在广东省政府任职。^②

身为粤北客家人,他很早便开始关注客家问题。“余自民国十七年(1928)秋,于辑录《粤东之风》后,即有意于研究客家历史与文化。”^③《粤东之风》收录的便是“客族”的歌谣,这是 20 世纪早期民俗学影响的产物。在书中,他将“广东人种”分成五类,即广府族、客家族、福佬族、瑶民族、苗獠族。^④1932 年,他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之托,赴粤调查民系,对象是“客籍”、“广府本地籍”军人百余名。当时受西方学术潮流影响,相信不同的人种具有不同的体质特征,因此也进行身体面貌的体质测量。^⑤在此后的客家研究中,他一方面继承了温仲和、钟用和、章炳麟、罗翊云等学者建立“客籍”与中原文化正统联系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受到美国文化地理学家韩廷敦(Ellsworth Huntington)及英国传教士 George Compbell 等人的影响,创造出了体系完整的“客家民系”学说。1933 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⑥首先系统地梳理了 19 世纪以来中英文文献对于客家的描述与研究,然后将客家描述成一个具有中原血统、在不同时期的迁移之下南来的“民系”,并详细论述了客家人五次南迁的历史过程,最后着力强调了客家的“血统”及“民族精神”。其师朱希祖亦称道“此后必无复有以贱族相欺凌者,此皆著书立说者之功,罗君集其大成,为功之尤巨者,其捍卫各族之心,深堪敬佩”。他所确立的这种客家研究范式,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

罗香林也非常重视族谱对于历史学研究的作用,早在 1930 年冬,便“尝于广东各地报章,刊载关于征求客家史料之后事。谓客家史料之

① 罗香林《荔垞文存序》,见《乙堂文存续编》卷一,香港:中国学社,1977 年 8 月版,84—86 页。

② 罗敬之《罗香林先生年谱》,国立编译馆 1995 年 11 月版,15—61 页。

③ 罗香林:《序篇客家谱乘之搜集及其意义》,见《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 年 3 月版,3 页。

④ 罗香林《粤东之风》,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4 年版。

⑤ 罗敬之《罗香林先生年谱》,台北:国立编译馆 1995 年 11 月版,20—21 页。

⑥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1933 年版。



编纂,当以客家各氏谱乘所载其上世迁徙源流,与其族裔支分布,为主要部分”。^①1956年由香港中国学社出版的《客家史料汇编》,收入了他历年收集的广东、香港、台湾等地40余姓族谱。他认为,这些族谱不但反映了客家人迁移的重要史迹,也体现了客家耕读社会、乡里自保等文化特征。^②20世纪60年代,他与伦敦亚非学院的裴达礼(Hugh D. R. Baker)一起,在新界收集了不少族谱;此后他的学生林天蔚、萧国健,也在犹他家谱学会的资助下,继续收集了大量族谱。^③尽管他将族谱中的迁移过程作为“信史”的做法,已受到后世学者的质疑,但他对这一丰富资源的搜集和利用,仍具有开创意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罗香林移居香港粉岭后,于1951年1月,受洗成为基督教崇谦堂教友,1954年并成为该会执事。^④这一事迹成为崇谦堂村这一较晚近的客家移民村,保存客家认同的文化资源之一。^⑤他和崇真会(即巴色会,1924年更名)几位牧师的密切往来,也使得双方都意识到,在“客家研究”这一范畴下,对方其实已做了大量工作,并可彼此借鉴。^⑥

实际上,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与民俗学家,罗香林的研究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民族史、民俗文化、唐史、近代史、港澳华侨史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⑦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客家研究并不是唯一的重心,他的贡献,便在于将客家研究学术化,同时为它在大的中国历史编纂上,创立了一席合法之地,正如他在《客家史料汇编》前言中所说:

客家历史,与近世中国发展,关系颇巨,不为继续研究,则

于中国近世历史,亦未有能明者。^⑧

“客家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领域,成为学者们可以讨论的对象,是从他开始的。

三、20世纪60年代以客家村落作为考查地点的研究

同样,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进行客家研究的学者,主要关心的也不是客家,而在于中国乡村社会。这一时期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人类学、社会学者,眼光逐渐从无文字的非洲、美洲等社会,逐渐转向有文字的中

① 罗香林《序篇 客家谱乘之搜集及其意义》,见《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3月版,3页。

② 罗香林《序篇 客家谱乘之搜集及其意义》,见《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3月版,5—22页。

③ 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版,15页;Elizabeth L. Johnson, Recording a rich heritage: research o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Leisure & Cultural Services Dept., c2000.

④ 罗敬之《罗香林先生年谱》,国立编译馆1995年11月版,68—69页。

⑤ 20世纪90年代著名的客家学研究者郭恩嘉的研究即涉及这一问题,见Nicole Constable,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⑥ 罗香林《基督教香港崇真会史略序》,见《乙堂文存续编》,香港:中国学社,1977年版,115—118页。

⑦ 吴建华《罗香林的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⑧ 罗香林《序篇 客家谱乘之搜集及其意义》,见《客家史料汇编》序言,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3月版,4—5页。

国地方社会,但是,由于无法直接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研究,香港的新界便被视为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试验场。正如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言:

在香港的‘新界’,进行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可能的。……我可以说,人类学家能够通过对这一处于英殖民管治下的小区域的研究,回答东南中国的某些问题。^①他建构的功能主义的宗族理论,对当时及后世学者影响都相当深远。

同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港英政府对新界地区的建设加强,原本的农业社会迅速地向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转变,这一转型对于中国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也成为学者们关心的议题。早在1950年即进入香港的华德英(Barbara E. Ward),即对香港西贡濠洲的水上人(boat people)生活与社会结构的改变进行了研究,她建立了一套“意识模型”,用于分析被视为“次等”的群体,如何表达自己认为“正统”的文化。^②

在这一背景下,60年代以降,一些学者陆续进入香港地区进行研究,他们多集中在一个或几个村落进行考察,但较多关心的是社会变迁对香港地方社会的冲击,宗族多被视为理解中国社会的根本。^③其中,也出现了几部以客家村落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弗里德曼的学生裴达礼的研究进行得比较早,他以上水廖氏宗族作为考察对象,1963年秋至1965年春在该地进行调查。廖氏现在被视作新界“本地”五大家族之一,^④不过罗香林在《客家史料汇编》中,指出他们是客家人;^⑤裴达礼也认为他们是被本地人同化的,他们的方言是客家话,但是以官话和广东话与周围的人交流。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小群来自惠州的客家移民,作为廖姓宗族的一支融入这一社群。^⑥这是一个客家群体在复杂的历史变迁中与本地融合的有趣例子,不过这并不是他主要关心和处理的问题,以上内容只是被简略带过。

瑞典人类学家艾尧仁(L. G. Aijmer),也是围绕社会变迁对中国传统乡村结构的影响进行研究。他在1964至1965年间,对香港新界东部马鞍山一带三个客家村落进行了调查,探讨了西方工业冲击对乡村社会结构和生活的影响。^⑦他注意到这些“客家”村落和周围本地村落相区别的特征,其中一个客家祖先神主牌位的形式与本地人群不同;他们没

① 莫里斯·弗里德曼著,刘晓春译《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前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页。

② Barbara E. Ward, Through other eye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conscious models’ —— mostl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 Elizabeth Sinn,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in Hong Kong, A Review”,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4 (1994): 47-169.

④ 萧国健《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1990年版。

⑤ 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3月版,357页。

⑥ Hugh D. R. Baker, 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Sheung Shui, London, Cass, 1968, pp. 38-39.

⑦ L. G. Aijmer,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in Hakka Societ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 (1967 Oct): 42-79.